

明代的三家《詩》學  
——兼論清今文《詩》學的興起

賀廣如

(抽印本)

人文中國學報 第十五期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〇〇九

# 明代的三家《詩》學

## ——兼論清今文《詩》學的興起

賀廣如

### 提 要

歷來研究《詩經》之學者，大都認為西漢三家《詩》的輯佚，自南宋王應麟《詩考》之後，元、明兩朝無人問津，直至清范家相《三家詩拾遺》，才又開始輯佚三家的學術工作。然而，自宋末至清三百多年間，明代雖無三家《詩》輯佚的專著，却有著明顯的“漢學”傾向，如重視漢人《詩》說及漢代經學傳授的系譜；而豐坊偽造與三家《詩》相關的著作，竟能引起相當的重視，足見當時學界對於三家《詩》的輯佚，有一定的需求；除此之外，明人猶輯佚不少緯書，並以《詩》中異文考據疑難，凡此種種，都為日後的清代輯佚，奠下重要的根基。清人承繼明代學者耕耘成果，兼以辨偽方法的刺激、輯佚風潮的影響，以師承法大量輯佚三家遺說，終使有清一代的三家《詩》輯佚成就輝煌。而清代今文經學的興起因素，亦可由《詩經》的角度重新思考，提供《公羊》學以外的視野。

**關鍵詞：**三家詩 辨偽 輯佚 豐坊 范家相

## 一、前 言

筆者近年從事於清代三家《詩》輯佚的研究，一直困惑：何以三家《詩》的輯佚會在清代蔚為風潮？自南宋王應麟（1223—1296）作《詩考》輯佚漢三家《詩》以來，元、明兩代，三家《詩》的輯佚或研究幾乎是銷聲匿跡的狀態。然而，清代自乾隆時期范家相（1715？—1769）作《三家詩拾遺》之後<sup>[1]</sup>，一直到道光年間，何以三家《詩》輯佚的著作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爐<sup>[2]</sup>？且此一風潮，甚且延續到清末民初，王先謙（1842—1918）《詩三家義集疏》一書集眾家之大成，如此方使潮流歇止。筆者認為，清代三家《詩》輯佚的現象，所具有的意義不應僅止於《詩經》學史的演變而已。若以較大的視野來觀察，則清代今文經學何以興起，三家《詩》的輯佚現象自然是一個極為重要的觀察點，而且，由此一觀察點切入，所得到的結論，很可能和歷來以《公羊》學切入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sup>[3]</sup>，此即本文問題之緣起。

在大量閱讀明代的《詩》學作品之後，筆者發現，明代學者並非對於漢三家《詩》毫不留意，其關注的方式，也許不以輯佚的形式出現，而是零星且不成系統地散佈在著作之中。但清人輯佚時所使用的方法、觀念，乃至內容等，却是將明人成果化零為整，以一成系統的形式逐步展現，使得內容愈加充實，換言之，清人的輯佚之所以能有如此成績，實乃由明人導其先路，奠下基石，故方能在此基礎上，立棟樹樑，砌入泥磚，以成其屋。職是之故，明人對漢代《詩》學的態度與運用，實緊密關係著清代三家《詩》輯佚的發展<sup>[4]</sup>，更進一步說，與清代今文經學的興起息息相關。

在探討明代的三家《詩》學之前，本文擬先把梳宋、清兩代輯佚三家《詩》成果的差距，以分析二者之間的變化與演進，是如何由一雛形式的探索，到具有明確方法且體系完整的斐然成

績，而二者之間的落差，是否能由明代學者來填補。在敘述宋、清之間的差距後，本文則進入論述明代《詩》學中的“漢學”傾向，主要由四個面向分述：一為漢人《詩》說，二為經學傳授系譜，三為豐坊（1500—1570）偽書<sup>[5]</sup>，四為輯佚及考據。藉著此四個項目的討論，便可知明人在論《詩》之時，如何看待並運用漢人《詩》說，尤其是三家《詩》學。最後，討論清代三家《詩》輯佚的興起，此一部分直承明人《詩》學而來，時而涉及明末清初之說，並不專以清代為限，大體亦分三小節：一為師承法的崛起，二為辨偽的刺激，三為輯佚的風潮。藉此三方面以說明清代學者如何承接明人三家《詩》學的成績，建立系統，兼以時代環境的鼓動，遂有三家《詩》輯佚之風潮。末章為結論。

特別要說明的是，曩昔筆者論范家相輯佚三家《詩》輯佚之動機，純粹由其個人之《詩》學立場考量，並不涉及其他外緣因素。今日此文，則以三家《詩》輯佚之發展為一現象，作一整體的討論，故探討之面向自是不同，而筆者亦擬藉之補充此一議題所應留意的學術及時代等內外緣之諸多因素，以使思考之面向更加周全。

## 二、宋、清之間

本節旨在探討宋代與清代輯佚三家《詩》的著作有何差別，其間的演進如何；並嘗試釐清如此的演進，需要哪些學術條件。下節再論明代《詩經》學的發展，是否能提供這些條件。

宋代三家《詩》輯佚的代表，自然是南宋王應麟的《詩考》。應麟在是書《自序》中，曾說明其輯佚三家《詩》之由，其文曰：

漢言《詩》者四家，師異指殊……今唯《毛傳》、《鄭箋》孤行，《韓詩》存《外傳》，而《魯》、《齊詩》亡久矣。諸儒說《詩》壹以毛、鄭為宗，未有參考三家者，獨朱文公《集傳》闕

意眇指，卓然千載之上，言《關雎》則取康衡，《柏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一洗末師專己守殘之陋，學者諷詠涵濡，而自得之躍如也。文公語門人，《文選注》多《韓詩章句》，嘗欲寫出，應麟竊觀傳記所述三家緒言，尚多有之，罔羅遺軼，傳以《說文》、《爾雅》諸書，粹為一編，以扶微學、廣異義，亦文公之意云爾。讀《集傳》者，或有考於斯。<sup>[6]</sup>

依序文之意，應麟是書受朱子(1130—1200)啓迪而作，其以三家雖亡，但斷簡殘文，尚多有之，如《文選注》中便常引《韓詩章句》之語，而史傳、《說文》、《爾雅》諸書，亦間有三家說之隻字片語，此一現象，若能加以利用，輯佚成書，便可重現部分三家遺說。值得注意的是，《文選注》中直接引用《韓詩章句》的內容，確實是一可靠的輯佚方式，此一方法，筆者稱之為“直引法”<sup>[7]</sup>。應麟依此法，在《文選注》、《經典釋文》等書中，輯出了相當可觀的成績<sup>[8]</sup>。但此一可觀成績，却僅限於《韓詩》的輯佚。因為《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而《韓詩》亡於唐、宋之間，至今猶存《外傳》十卷，因其亡佚的時間較晚，故引用的書也較多。但若僅靠上述的直引法，想在漢晉諸書中尋找《齊詩》與《魯詩》的遺說，所能輯出的內容，便寥寥可數了。例如輯《魯詩》時，應麟只能輯到在《漢書·杜欽傳》、《禮記·坊記注》、《儀禮·士昏禮注》等書中載明為《魯詩》遺說的內容<sup>[9]</sup>，是以《魯詩》輯佚的成果，與《韓詩》相差極大；因此，除了直引法之外，應麟在輯《齊詩》時，引用了《漢書》中翼奉、匡衡及蕭望之(前106—前47)三人本傳或奏議，以及《後漢書·伏湛傳》中對於《詩經》的看法，文末自注以諸人治《齊詩》，故其說應屬《齊詩》之學<sup>[10]</sup>。

很顯然的，應麟在輯《齊詩》時，已用了直引法以外的辦法，也就是以學者個人的學術傳承為考量，認定其說必有所承，此法可視之為“師承法”<sup>[11]</sup>；然而，習《齊詩》者衆，並不僅止於翼奉等三人，何以應麟僅輯三人之《詩》說？此外，此法何以不用於輯佚《魯詩》與《韓詩》的部分？應麟在《詩考·後序》中曾云：

《詩》四家異同，唯《韓詩》略見於《釋文》，而魯、齊無所考。劉向《列女傳》謂蔡人妻作《采芣》，周南大夫妻作《汝墳》，申人女作《行露》……《新序》謂伋之傅母作《二子乘舟》，壽閔其兄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楚元王受《詩》於浮丘伯，向乃元王之孫，所述蓋《魯詩》也。鄭康成注《禮記》，以“于嗟乎騶虞”為嘆仁人，以《燕燕》為定姜之詩……康成從張恭祖受《韓詩》，注《禮》之時，未得《毛傳》，所述蓋《韓詩》也。<sup>[12]</sup>

劉向(前77—前6)《列女傳》、《新序》所述蓋《魯詩》，鄭康成所述蓋《韓詩》。應麟對於此處以師承法所下的結論，充滿了不確定感，也說明了何以在輯佚《魯詩》與《韓詩》之時，不願輕易使用此法的原因。且應麟即使以此法輯佚《齊詩》，也用得相當含蓄，僅止於翼奉等三人，故應麟對於以師承法輯佚三家《詩》的態度，顯然相當保留。必須說明的是，應麟輯《魯詩》時，並未用劉向的任何著作，反而是在輯《韓詩》時，用了劉向的《說苑》<sup>[13]</sup>；輯《齊詩》時，用了劉向的《新序》<sup>[14]</sup>，此舉正可顯示應麟作《詩考》時，對師承法尚未完全信任，故有此矛盾現象<sup>[15]</sup>。

在輯三家遺說之後，應麟還輯了先秦兩漢諸書中的逸詩<sup>[16]</sup>，以及與現存《毛詩》不同的異字異義<sup>[17]</sup>，此一部分，不分家數，僅逐條羅列。

在南宋王應麟的《詩考》之後，下一部輯佚三家《詩》的專著，便是清乾隆時代范家相的《三家詩拾遺》，此即是清代三家《詩》輯佚的首要著作。家相此書，首列《三家詩源流》，分“三家總記”、“《魯詩》傳授”、“《齊詩》傳授”、“《韓詩》傳授”、“漢魏說《詩》不著傳授者”等項目。在各家傳授的項目下，家相引東漢班固(32—72)《漢書》及唐陸德明(556—627)《經典釋文》等書，以明各家傳授之衆多學者，而在“漢魏說《詩》不著傳授者”的部分，則羅列出一些漢代學者及其著作，同時說明部分著作中

之說法與《毛詩》顯有不同，應出於三家，且其中如劉向之《列女傳》、《新序》、《說苑》，雖其人本傳不著傳授源流，但向家世學《魯詩》，其說便應視為《魯詩》；而賈誼（前 201—前 169）《新書》中論《騶虞》，其說與《魯詩》合，故是書所論，亦宜視為《魯詩》遺說<sup>[18]</sup>。

在卷首的《三家詩源流》之後，家相於卷一則輯與《毛詩》異文者，名曰“文字考異”，此猶《詩考·異字異義》中的《異字》部分<sup>[19]</sup>。卷二則輯古逸詩，亦類近於《詩考》之輯逸詩，但分門別類，較之《詩考》，尤見其條目清晰，出處明白詳細<sup>[20]</sup>。卷三之後，便依三百篇次第，逐詩輯列三家遺說，遇有不著傳授、家數不明者，便統列於三家之後，並不強分。

家相是書之作，其傳承於應麟《詩考》之處相當明顯，如對於逸詩及異字的蒐羅，且以直引法輯佚三家《詩》說的內容，家相自然全盤接收；但是書中首列三家傳授源流，並依此傳授系譜網羅諸人說《詩》內容，以分別歸入各家遺說之輯佚成果，此一作法，便是師承法的運用。但家相對此法態度，相較於應麟猶疑不決、不輕用此法的情況，顯然有極大的差異。更清楚地說，家相此書的輯佚成果，之所以能較諸《詩考》大有進展，實由於師承法的加入，特別是《魯詩》的輯佚內容，頓時豐富許多。

值得注意的是，在師承法之外，家相還創用了一個新的方法，即是以前述的直引法及師承法為基礎，凡遇有不同於《毛詩》者，便先歸入三家《詩》的大範疇中，之後，再依次對照以直引法輯佚出的《韓詩》內容，或以師承法輯佚而成的各家內容，遇有合者，便逕自歸入相合的某家，如上述賈誼《新書》歸入《魯詩》即是一例；而若未遇合者，則仍泛屬於三家《詩》，並不分別屬之任何一家。由於此法實兼具推理與臆測的成分，因其所依憑者，往往並非直接的證據，如師承法所輯，實乃據相關學術背景推測而來，而以推測所得之結果為據，再加上進一步的推測，如此一層一層衍生的結果，實不免摻含臆測的成分，故名之曰

“推臆法”。

在直引法、師承法、推臆法的交互運用之下，成就了家相《三家詩拾遺》一書。家相對此三種輯佚的運作，已建構出一完整的體系，此後輯佚諸家，如阮元（1764—1849）、陳壽祺（1771—1834）、陳喬樞（1809—1869）父子、馮登府（1780—1841）、魏源（1794—1857）、王先謙（1842—1918）等人，容或因對家數的分判不同，致使所輯之結果互異，但大抵仍循家相腳步，以極廣義的師承法與推臆法，大量輯佚三家遺說。

從宋到清，三家《詩》輯佚的成果之所以能有極大的進展，關鍵在於方法的拓展，而方法之所以建立，自然與其學術觀念有關。王應麟對師承法未敢輕信，態度保留，但范家相却大量運用，甚至再依此擴展出推臆法，二法交錯運用，衍生出許多原本以直引法無法輯出的三家遺說，且可分判其說之家數，將之歸屬於某家。其中受惠最多的，應屬《魯詩》。家相所輯之《魯詩》份量，與應麟相較，不啻霄壤。當然，師承法與推臆法並非毫無問題，應麟的保留態度，實有重要之學術意義，唯此議題並非本節之重點，故暫不討論。

### 三、明代《詩》學中的“漢學”傾向

本節論明代《詩經》學中的“漢學”傾向。此所謂“漢學”，自然應包括齊、魯、韓、毛四家之學，但本文將特別著重於與三家《詩》相關的論述，《毛詩》的部分，則不深論，冀能呈現明人在三家《詩》研究上的貢獻。

歷來學者論明代經學，負面評價不斷，皮錫瑞（1850—1908）即是此中代表，認為“元不及宋，明又不及元”，且其書逕以“經學積衰時代”名之<sup>[21]</sup>；但為明代平反者亦大有人在，如林慶彰先生《晚明經學的復興運動》<sup>[22]</sup>、楊晉龍先生《明代詩經學研究》等<sup>[23]</sup>，均深入論述明代中後期以來的經學發展，以為清乾

嘉時期的漢學風潮，實導源於明代中葉<sup>[24]</sup>，故明代經學的意義，實不容小覷。而類似的論點，亦不斷出現於學界<sup>[25]</sup>。大體而言，明代中葉之後，由於學者對於官學化的宋、元經說不滿，轉而傾向去古不遠的漢學，形成了所謂的“漢宋學問題”<sup>[26]</sup>。在《詩經》學的部分，則逐漸呈現一種反《朱傳》的聲音，特別是朱子主張的“淫詩說”，受到極大的攻擊，許多學者改為支持《毛傳》等漢人《詩》說<sup>[27]</sup>。當然，亦有固守《朱傳》而反對《詩序》者<sup>[28]</sup>，而尊《序》抑朱、雜采漢宋、或辨正漢說等派別<sup>[29]</sup>，便形成了明代《詩經》學多元化的面貌。

在重視漢學的呼聲中，明人所看到的漢學，並不僅止於《毛傳》、《鄭箋》而已，還有漢代諸書中的《詩》說。這些《詩》說，散存於經注、史傳及各類著作之中，許多說法顯然異於《毛傳》，故極可能為三家《詩》的遺說。此外，支撐整個漢學傳授的系譜，亦受到相當的重視。故明人對漢學的追溯，除了表象的成果外，更有整體的學術背景，或考據，或引用，或輯佚，或偽造，或作圖，以各種不同的方式探索漢代《詩》學。以下將從四個面向論述明代《詩》學中的漢學傾向，如何為清代輯佚三家《詩》鋪路。

### 1. 漢人《詩》說

明代中葉以後，學者論《詩》，在《朱傳》之外，往往兼及《毛傳》、《鄭箋》，更有甚者，還留意到毛、鄭以外的漢人《詩》說。這些《詩》說，雖未必能判別確定的家數，但按理應可統歸於三家《詩》說。而引用的學者，部分似有意於收輯三家《詩》說，部分則只是兼引毛、鄭以外的漢人《詩》說，以廣其義而已。茲舉數例以明之。

先看朱陸樛(1517—1586)《五經稽疑》。是書卷三論《毛詩·采芣》曰：

《采芣》，《韓詩》曰：“傷夫有惡疾也。”《詩》云：“采采芣苢，薄言采之。”《薛君章句》曰：“芣苢，臭惡之菜。詩人

傷君子有惡疾，乃作是詩。芣苢雖臭惡，我猶采采而不已，以比君子。言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列女傳》載宋女既嫁于夫，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女不從，即此詩之意也。<sup>[30]</sup>

朱氏於此引用《韓詩》的《薛君章句》，又引劉向《列女傳》討論《采芣》的內容。顯而易見的，《列女傳》的說法與《韓詩》頗為一致，均以夫有惡疾，其婦不離不棄解之。但此詩歷來都依《小序》解，其文曰：“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sup>[31]</sup>朱氏是書，本參訂諸家之說而折衷之<sup>[32]</sup>，此處不引《序》說，却引《韓詩》及《列女傳》，其意即不以《序》說為然。故朱氏於《序》說不安處，則留意歷代《詩》家，且上及漢代的其他《詩》說，此一現象，在明代《詩》學的發展中，值得關注。

其次，論黃道周(1585—1646)。黃氏《榕壇問業》以問答的方式討論《關雎》與《鹿鳴》之詩旨，其言曰：

尊光又問：“《關雎》、《鹿鳴》冠於《風》、《雅》，乃《齊》、《魯》、《韓》三家皆以《關雎》為康王政衰之詩。《杜欽傳》曰：‘佩玉晏鳴，《關雎》刺之。’漢明帝詔曰：‘應門失守，《關雎》刺世。’太史公云：‘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蔡邕《琴操》謂《鹿鳴》大臣所作。王道衰，賢者隱，故大臣託之諷諫。繇是而觀，《詩序》參差，皆非聖門本說，晦翁盡刪之，是也。吾門時常何以不喜晦翁刪《序》？”某云：“《詩》多譎諫，主文而無罪，如此等詩，性情禮義，前賢猶云刺時，則鄭、衛淫詩，或是刺時所作，而晦翁皆謂淫者之口，此處乖謬，害意泥詞，非謂其刪《詩序》也。”<sup>[33]</sup>

此段文字，表面的主旨在討論朱子刪《序》及“淫詩”說之是非，但問者所藉以論斷《詩序》對錯的根據，却是《齊》、《魯》、《韓》三家及漢代諸人的《詩》說，且黃道周亦以為然。問者未細分諸說隸屬三家《詩》的某家，蓋以《漢書·杜欽傳》、蔡邕(133—

192)《琴操》等說泛歸三家。其以三家評《序》之是非,較諸上述朱氏留意漢人《詩》說的情況,更進一步,至少顯示三家《詩》在黃道周論《詩》的考量中,佔有一席之地,而且是重要的席位。

再次,論胡紹曾的《詩經胡傳》。胡氏此書,解詩前必先引《詩序》及《申培詩說》,之後再酌引他家說法。其論《柏舟》云:

《序》:“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詩說》:“康叔因管叔欲害周公,挾武庚以畔,憂之而作。”○子貢《古詩編次》曰:“管叔封于邶,與蔡叔、霍叔、康叔監殷,四國害周公,康叔諫不聽,三叔遂以殷畔。康叔憂王室,賦《柏舟》。子曰:‘仁矣!吾于《柏舟》見匹夫之不可奪志也。’”晦庵極排此序,至謂得罪千古。然從來忠臣戀主,或稱美人,或稱夫君,自託棄婦,詩之寓言,何所不至。在讀詩者,奪盃澆磔,假途濟師,又何所不至。如《列女傳》成于劉向,以為衛宣夫人自誓而作,亦《魯詩》說也。及論恭顯,則以群小為小人,如駁《序》,莫急于晦翁,而《孟子》註仍以仁人代姜氏,蓋習《詩》之法,要于達理明心,不必專務攻訐。<sup>[34]</sup>

引文中的子貢《古詩編次》,即《子貢詩傳》,而《詩說》即《申培詩說》,二書皆為偽書,且其間關係密切,詳細情況,下文將會討論。胡氏誤信《申培詩說》與《子貢詩傳》,故屢引其說,尤其是《申培詩說》,幾乎每詩必引。而文中亦以劉向《列女傳》之說為《魯詩》說,蓋猶如王應麟之推測,以劉向家學斷之,此即師承法的觀念運用,但胡紹曾之態度,顯然較應麟肯定,並不見猶豫之意。

再看胡氏論《燕燕》。其文云:

《序》:“衛莊姜送歸妾也。”○《詩說》:“莊姜與婦戴媽皆為州籬所逐,同出衛野而別,莊姜作詩以贈媽焉。”○《韓詩》曰:“定姜歸,其姊送之而作也。”○《魯詩》曰:“此衛夫

人定姜詩也。定姜無子,立庶子伋,是為獻公,無禮于定姜,故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以孝于寡人也。”<sup>[35]</sup>

按:文中所引《魯詩》內容,係來自鄭玄《禮記·坊記注》<sup>[36]</sup>,胡氏所以將之列入《魯詩》,乃襲自王應麟《詩考》一書。應麟並於此段文字末注曰:“《釋文》曰:此是《魯詩》。”<sup>[37]</sup>而胡氏此處除了按例引用《詩序》、《申培詩說》之外,同時列出了《韓詩》及《魯詩》之說。姑不論胡氏以何法輯得《韓》、《魯》二家《詩》說,其並列出二家說於《序》後,便可顯示胡氏對《毛詩》以外的漢代《詩》學,也就是三家《詩》說,相當重視,此點突顯了三家《詩》學在明代《詩經》學的研究中,猶如一伏流般,默默地在發展著,並未斷絕。

最後看胡氏論《二子乘舟》。其文曰:

《序》:“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詩說》:“宣公欲立少子朔,使伋、壽如齊,而沉之于河。國人傷而作是詩。”○《齊詩》曰:“衛宣公之子壽,閔其兄伋且見害而作。”……劉向《新序》:“傅母憂其死也而作。”據《左傳》“待諸莘”,服子慎云:“莘,衛東地。”京相璠云:“陽平莘亭有二子廟,謂之孝祠。”或曰待于隘,或曰竊以先,或曰飲之酒,或曰沉于河,詩人第曰“乘舟”,不必果同行也。<sup>[38]</sup>

在《序》與《詩說》之外,胡氏猶引《齊詩》及劉向《新序》之說,連同上段論《燕燕》的引文,《齊》、《魯》、《韓》三家《詩》便俱全了。事實上,胡氏此以《新序》之說入《齊詩》,亦襲自王應麟的《詩考》<sup>[39]</sup>,足見胡氏受《詩考》一書影響不小,而胡氏雖誤信《申培詩說》及《子貢詩傳》等偽書,但其承襲《詩考》、彙輯三家《詩》的意圖,可說是相當明顯。

在論述了朱陸樛、黃道周、胡紹曾之後,本文再舉何楷(一1625—)《詩經世本古義》為例,以明漢人《詩》說在明代中葉以

後受到的關注情況。

先看何氏論《兔置》。其文曰：

《子貢傳》謂文王得良臣于野，周人美之。而《申培說》則直謂文王聞太顛、閔夭、散宜生皆賢人而舉之，國史詠其事而美之，蓋依附墨子之說。……劉向云：“肅肅兔置，柶之丁丁，言不怠于道也。”焦氏《易林》云：“兔置之容，不失其恭。”<sup>[40]</sup>

按：上引劉向之文出自《列女傳·楚接輿妻》<sup>[41]</sup>。何氏於此一如胡紹曾亦引《子貢詩傳》及《申培詩說》，唯何氏實知此二書乃偽書<sup>[42]</sup>，但仍不憚引之，知其偽而用之，蓋欲廣其義耶？除劉向之說外，何氏又引《易林》<sup>[43]</sup>，然並未分別家數。《易林》此書，論《詩》之處極多，清人多將之入《齊詩》，是《齊詩》輯佚中相當重要的資料來源。

再看《執競》。其文曰：

桓寬《鹽鐵論》云：“周文武尊賢受諫，敬戒不殆，純德上休，神祇相貺。《詩》云：‘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夫篇中第言武王，未嘗及文王也，而以文武並稱，於論疏矣。《序》及蔡邕《獨斷》皆云祀武王之歌也。<sup>[44]</sup>

何氏於此用桓寬《鹽鐵論》引《詩》處討論詩旨，最終則以《詩序》及蔡邕《獨斷》斷桓寬論疏，所言不合。值得注意的是，何氏所用到的漢人《詩》說，較諸前三人，顯然有了其他的拓展，不再只是局限於《韓詩薛君章句》及劉向《列女傳》等書，而何氏雖並未將諸書分判家數，諸書所論，較諸《詩序》，或合或不合，要之，提供了《詩序》以外的參考。

最後，則看何氏論《無田》<sup>[45]</sup>：

《序》云：“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諸儒皆祖其說。

故揚雄云：“田甫田者，莠驕驕；思遠人者，心切切。”桓寬《鹽鐵論》云：“夫治國之道，繇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親附，然後來遠；百姓內足，然後郵外。今中國弊落不憂，務在邊境，意者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費力而無功，《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驕驕’，其斯之謂與！”蓋舊說相傳云爾。朱子謂未見其為刺襄公，誠是。《子貢傳》、《申培說》則皆謂齊景公欲求諸侯，急于圖霸，大夫諷之，亦祖《序》之意而少變其說，然細按之，實與詩辭不貼。要之，非也。<sup>[46]</sup>

何氏歷引《詩序》及揚雄（前53—18）《法言》<sup>[47]</sup>、桓寬《鹽鐵論》、《子貢傳》、《申培說》等書，最後則以朱子之說為是，諸說為非。其中《子貢傳》及《申培說》二書為偽書，真正屬漢說者，除了《詩序》外，只有揚雄及桓寬的說法。一如上文所論，何氏所用的漢代《詩》說，取材與他人不盡相同，雖何氏並未分別家數，但對於瞭解《毛詩》以外的漢人《詩》說，實具重要的提示功用。

上述所引諸人《詩》論，相較於元代以來，以及明代前期幾乎全面性羽翼《朱傳》的《詩經》學現象<sup>[48]</sup>，已大有不同。諸人除了留意漢代的毛、鄭外，還兼及其他學者的《詩》說，尤其是劉向《列女傳》、《新序》，蔡邕《琴操》、《獨斷》，桓寬《鹽鐵論》，揚雄《法言》，乃至《易林》等書；這些材料，在清代正式進入三家《詩》輯佚的階段時，都提供了豐富且重要的內容，而諸書被判分判之家數容或不同，但清人大量取用諸書以為三家《詩》輯佚的內容，却是不爭的事實。換言之，明人輯引漢代毛、鄭以外《詩》說的情形，對於沉寂已久的三家《詩》的輯佚而言，無異是透露了一線生機，此生機雖未茁壯、長養，但却極富潛力，不容輕忽。

## 2. 經學傳授系譜

上文已言，明人對漢學的重視，除了經書注疏等著作以外，還有整體的學術背景。漢時由於設立學官，故尤重師法與家法<sup>[49]</sup>，因此，藉由傳授系譜，便可明瞭各經傳授的發展概況。明人費密《弘道書·道脈譜論》云：

黃洪憲曰：經藝奧微，漢儒精通其旨，使非注疏先行於世，則肩錡未啓，宋儒之學，未必能窺其堂奧；即使宋儒生經殘籍滅之後，其所窺識，未必能過注疏也，矧漢去古未遠，表章之後，遺書肆出，諸儒校讎，未必無據焉，可盡嘗哉？於是張朝瑞撰《孔門傳道錄》紀七十子、朱睦㮮序《授經圖》列漢儒、鄧元錫纂《學校志》從七十子序，及近代王圻作《道統考》，取儒林世系，收秦漢魏晉南北隋唐諸儒於宋之前著論，明其不可廢。自諸儒之說出，而四子之書行，談學仍歸中正，七十子與漢唐抱道諸儒，為宋遏絕者五六百年。萬曆間始復禘祫，聞道世系之中。吾道昔何可傷，而今乃可慶也！<sup>[50]</sup>

費氏此文，除了明白表達對漢儒的肯定之外，也透露了對宋儒的不以為然。而更重要的是，當時學者重視儒學傳承，故迭有著作，以明授受系譜。其間最有成績的，應屬朱睦㮮的《授經圖》。

朱氏曾自道是書之由來，其文曰：

余觀《崇文總目》有《授經圖》，不著作者名氏，叙《易》、《詩》、《書》、《禮》、《春秋》三家之學，求其書，亡矣。及閱章俊卿《考索圖》，六經皆備，間有訛舛，余因考之。蓋自東漢而下，諸儒授受，勘有的派，云其經義，或私淑，或自治，或習之國學，俱稱為某授、某受，可乎？於是稽之本傳，參之諸說，以嘗請業及家學者，各為之圖，以一二傳而止者，亦錄之以備咨考。舊圖俱無傳，圖後或錄經論數條，而諸儒行履弗具，使覽者不知其為何如人也。余既為圖，復摭摭其要而作傳，無關經學，無禘世教者，皆略焉。傳成，以諸儒著述及歷代經解附之，為若干卷。藏之家塾，以俟同好，庶斯道之不墜也。萬曆元年孟秋望日。<sup>[51]</sup>

朱氏自云，此書受宋人章如愚之影響，在章氏《考索圖》的啓發

之下，稽補相關資料，不僅有圖以明其人授受，更有傳以明其人學行，故對於漢代各經書傳授的發展概況，有相當詳實可靠的整理。此書中重現漢代師承源流，特別是對亡佚、殘缺的三家《詩》學說而言，提供了重建學術體系的可能性，故尤具意義。因為在蛛絲馬跡的追索中，可以藉由體系的建立，將散逸於各書中的片斷重新組合，於是，原始樣貌方能逐漸拼湊，窺見一模糊的雛形。事實上，南宋呂祖謙(1137—1181)之《呂氏家塾讀詩記》中，亦有“訓詁傳授”一節述《詩》學源流<sup>[52]</sup>，而明人季本(1485—1563)則於《詩說解頤》中損益呂文，敘述《詩》學傳授情況<sup>[53]</sup>，但二書所述皆以《毛詩》授受為主，至於三家流衍，則僅止於魯之申公、齊之轅固、燕之韓生，此後便全然不提，極為簡略，與朱氏《授經圖》所作圖傳，相去遠甚。而前述范家相《三家詩拾遺》於書前卷首列三家《詩》源流，雖無圖表，但據史傳節引與三家《詩》傳授相關學者的記載，其作法即與朱氏極為相似。清代以後，仍有學者依朱氏步履，繼續從事此類學術工作，足見朱氏此書之影響。其間詳細的發展，下文將會有進一步的討論。

### 3. 豐坊偽書

明代後期的《詩經》著作，出現了幾部相當重要的偽書，之所以說相當重要，是由於時人大量引用，造成了一定的影響，故在學術史上有重要的意義。這幾部書即是《子貢詩傳》、《申培詩說》及《魯詩世學》。

此三書的偽造，應由《魯詩世學》說起。《魯詩世學》一書，依《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天津圖書館藏清鈔本，凡三十二卷，書前有太子詹事前國子祭酒香山黃佐(1490—1566)才伯序。卷首為《孔氏傳》一卷，題端木賜子貢述，一般稱為《詩傳孔氏傳》或《子貢詩傳》。又因書前黃佐序云：“申公生於秦，老於漢，傳子貢之學，居毛鄭之先，蓋燕趙計偕之士也。”<sup>[54]</sup>故以是書乃申培公《魯詩》學的源頭，因此是書亦名曰《魯詩傳》。其後又有《序》一卷，乃抄錄《詩序》全文。之後方為《魯詩世學》三十

二卷的正文，篇首題曰：宋豐稷相之正音、明豐慶文慶續音、豐耘用勤補音、豐熙原學正說、豐道生人季考補、門人何昆汝僉續考。所題“豐道生”者，即明人豐坊，字存禮，後更名為道生，別號南禺外史。

豐坊於是書卷一《周南·關雎·考補》引黃佐言，說明《魯詩》的發現過程，大意謂東漢諸儒以竹帛朽腐，傳寫易訛，靈帝光和年間，乃詔蔡邕(133—192)、楊賜(?—185)等人以八分勒石。至魏正和年間，諸儒復以古文不可泯沒，乃詔虞喜(281—356)摹孔壁古文於石，另有邯鄲淳以小篆、鍾會(225—264)以八分附其後以為釋文。周大象中，光和石經徙洛，舟敗而沉；而正和石經，則於隋大業末，埋於秘省；宋時王韶開河，乃得楊賜等所書之《魯詩》及《尚書》獻之；而蔡京(1047—1126)修御史臺，發地又得正和三體七經之石及光和石經之《論語》、《爾雅》，徽宗詔貯秘書省。當時豐稷(—1060—)任御史中丞兼侍講，趙明誠(1081—1129)等繼入秘省，皆有拓本。故豐家自豐稷以來，便有部分光和石經及正和石經之拓本，其中《魯詩》的內容，便是以魯人申培之說為主，且其說又以孔門高弟子貢(前520—前456)為宗，是以其說較得孔子旨意。而豐家歷代又輯錄唐宋元以來及近世諸儒說《詩》可采者，遂有《魯詩世學》一書<sup>[55]</sup>。

關於《魯詩世學》的由來，根據上述說法，便知是書問題叢生<sup>[56]</sup>，但此暫且不論。先論《子貢詩傳》的出現。是書原以古篆書之，篇次與《魯詩世學》相類而稍有不同，其後又由他人逐錄重刻，並改定篇次，改定後的《子貢詩傳》刻本，篇次却與《魯詩世學》相仿，蓋即受其影響。

依今人考訂，現存鈔本的《子貢詩傳》，蓋即為豐坊所偽，以是書出於其家，歷代學者，除豐坊外，無人知之；且豐坊精於各體書法，又好作偽書。而刻本的《子貢詩傳》，則可能為明人王文祿(1522—1566)所改竄<sup>[57]</sup>。至於《魯詩世學》，應為豐坊一人所作，並非由歷來祖考累積而成，即使書前黃佐的序，亦應為豐坊

偽造無疑，而是書不僅羽翼《子貢詩傳》之說，亦可藉此抒發己見<sup>[58]</sup>。

而《詩說》一書，題“漢太中大夫魯申培撰”，故一般又稱之為《申培詩說》。是書之出，則在嘉靖末年至隆慶初年之間，亦為偽作。作偽之法，則襲自《魯詩世學》。《魯詩世學》之“正說”，常引“子貢傳曰”、“申公曰”、“朱子曰”、“舊說”、“先儒”等說，《申培詩說》之作者便據之抄錄成篇，以成其書<sup>[59]</sup>。至於作偽者何人，歷來有豐坊與王文祿二說，今以是書既襲豐氏偽書，必不為豐氏所作，故應為王文祿的可能性較大<sup>[60]</sup>。

上述三書，雖作偽者不盡為豐坊，但均與豐坊造偽關係密切，可視為一個體系，故本文仍以“豐坊偽書”統稱之。三書雖係偽書，但却在當時引起相當大的重視，刊刻、引用者頗多<sup>[61]</sup>，其中不乏知名學者，如郭子章(1543—1618)、毛晉(1599—1659)、凌濛初(1580—1644)、黃道周(1585—1646)等。諸人引用原因不止一端，好古崇賢者有之，因反《朱傳》淫詩說遂轉而崇漢《詩》說者有之，因疑《詩序》而認同其說者有之，反毛、鄭、朱子而趨新說者有之，博采諸家說法者亦有之，甚而有知其偽而用之者<sup>[62]</sup>，原因相當複雜，難以概論。然此中值得留意的現象，在於《毛詩》及《朱傳》已無法滿足時人的需求，這些偽書，挾著漢今文《詩》說的旗幟，不僅去古未遠，更令人耳目一新。

明代中期以後，朱學一統天下的局面，不斷受到陽明(1472—1528)學的挑戰，在《詩經》學的領域中，《朱傳》的“淫詩”說，引發了許多的爭議，但陽明在此一問題上，並未致意，這對於受到王學影響，且關心《詩經》學的學者而言，無異有一塊極大的空白亟待補足，以便反擊朱子“淫詩”說的主張<sup>[63]</sup>。

豐氏在《魯詩世學》的“考補”中，便曾編造陽明與黃佐的對話，說陽明深悔不辨晦翁“淫詩”說之誤，恐不免為聖經之辱；同時又藉黃佐之口，明其為夫子(孔子)辨、為先師(豐熙)辨、為陽明辨之決心<sup>[64]</sup>。而之所以為豐熙辨，乃因根據豐坊的安排，《魯

詩世學》的“正說”應由豐熙所作，但陽明弟子季本屬於“正說”內容多有譏刺，蓋疑其偽，故豐坊遂於“考補”中不斷詆毀季本<sup>[65]</sup>，以為其父豐熙辯論，實則是為豐坊本身而辯。而豐坊何以必假黃佐之口？則因黃佐與季本二人同師陽明，且黃佐兼為豐熙弟子，故藉黃佐之口，將孔子、豐熙、陽明三人劃為同一陣線，再將此陣線收歸於《魯詩世學》一書，如此一來，不但可以幫豐坊此書貼上一個正統的孔子標籤，還可收編當時的王學學者，集反朱者之目光於是書<sup>[66]</sup>。

豐坊很聰明地利用了王學學者反對“淫詩”說的需求，填補了《詩經》學史上的一塊空白，同時也教訓了想要戳破偽書身份的季本，真可謂一舉數得。然而，何以豐坊選擇三家《詩》，又何以選擇《魯詩》呢？前文已云，朱子學受到挑戰，檢討宋學之說時有所聞，因此漢學遂成了另一種選擇；然而，漢代《毛詩》中的《詩序》，爭議不少，而三家《詩》則因亡佚已久，此時面世，猶如新說，但又具有漢代的背景，便成了最佳的選擇，故能吸引當時學者的目光。至於何以選擇《魯詩》？三家《詩》中，《韓詩》殘留最多，王應麟《詩考》以直引法便輯出不少《韓詩》內容，故不易造偽；至於《齊詩》，則因以陰陽五際論《詩》，深奧難懂，難以偽造；最後，只剩下《魯詩》，班固《漢書·藝文志》謂三家《詩》：“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sup>[67]</sup>言下之意，似以《魯詩》最近《詩》之本義。故對豐坊而言，在各種情況的考量之下，《魯詩》無疑是最好且自然而然的選擇了<sup>[68]</sup>。除此之外，為了與相傳為子夏所作的《詩序》媲美，豐坊便在申公所傳的《魯詩》上安插了子貢作為源頭<sup>[69]</sup>，以明其學傳自孔子，此蓋即《子貢詩傳》所作之由<sup>[70]</sup>。而《申培詩說》，則無異是邯鄲學步，眼見《子貢詩傳》引起注意，遂藉機抄襲書中諸說，以成為漢代《魯詩》的唯一遺作。不辨其偽者，甚至視此書比《魯詩世學》更加重要，應與《子貢詩傳》並駕齊驅<sup>[71]</sup>。

由上述分析可知，不論是偽造《子貢詩傳》，抑或是《魯詩世

學》，實乃因豐坊深知當時學術市場的需求及取向，進而精心計算所得的創意成果<sup>[72]</sup>。前文已云，繼南宋王應麟《詩考》之後，在明代並無專輯三家《詩》的著作，故對於相信這些偽書的學者來說，從《子貢詩傳》，到《申培詩說》、《魯詩世學》，無疑是當時難能可貴的三家相關著作了，不但可滿足崇漢學者的需求，對於尊宋學者而言，仍不失為一種新的參考。

豐坊系列的偽書陸續出現於明嘉靖中期之後，隨即有不少學者疑此書為偽作，明末時已有辨偽者，如周應賓、陳弘緒（1597—1665）、陳元齡等<sup>[73]</sup>。諸人辨偽方法多端，其中有一種方法，特別值得留意。茲引陳元齡辨豐書之偽，其文曰：

《魯詩》雖亡，其散見於他書，單詞隻語，亦時有存。《列女傳》、《新序》、《說苑》等書，其稱《詩》與毛氏異，如蔡人之妻作《芣苢》，周南大夫妻作《汝墳》，申人女作《行露》，衛宣夫人作《柏舟》，定姜送婦作《燕燕》，黎莊夫人及傅母作《式微》，伋傅母作《二子乘舟》，莊姜傅母作《碩人》，息君夫人作《大車》，壽閔其兄作《黍離》，皆《魯詩》也。向為楚元王之孫，元王受《詩》於申公，故向所稱皆《魯詩》，而今說無一篇合，其非漢三。<sup>[74]</sup>

此以師承及家學淵源斷定劉向著作所言俱屬《魯詩》，係前文所云南宋王應麟《詩考》猶疑，而清范家相大量運用的輯佚方法，也就是師承法。其實，若仔細比對陳元齡此段文字與前引應麟《詩考》後序之內容，會發現二者內容極為相近，因同樣論及劉向著作之引《詩》，但應麟的斷語乃“（向）所述蓋《魯詩》也”，而陳氏的斷語却為“故向所稱皆《魯詩》”，語氣已不再猶豫，是肯定的說法。陳元齡的時代，介於王應麟與范家相之間，王應麟的猶疑，陳元齡的肯定，范家相的大量運用，此中的變化，著實耐人尋味。

元齡又曰：

《楊賜傳》：“康后晏起，《關雎》斯作”，其事見《魯詩》。《說苑》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漢書注》曰：“《魯詩傳》曰：‘古有梁鄒者，天子之田’”，而今俱無此說。其非漢五。<sup>[75]</sup>

其後又云：

大抵此書嘉、隆以前俱不經見，其出近時贗撰無疑。至《子貢詩傳》，尤《詩說》之後乘也，猶幸著書人不詳考《魯詩》之興廢，與夫散見諸書之逸語，故今得執以考訂，若使并《列女傳》諸書所引用者而俱盜之，其不以爲真《詩說》者幾希！<sup>[76]</sup>

元齡此說，指出了辨僞可用之法，係詳考散見於劉向諸書之逸語。而此一方法，若細思之，不但可辨僞，可造僞，亦可輯佚，如何運用，端視學者之心術純正與否。

然而，元齡指出的這條光明大道——師承法，豐坊却未善用，前云王應麟對此法採保留態度，也或許豐坊亦不以此法爲然。事實上，在明末辨僞諸家中，亦僅陳元齡採用此法，此一現象，或可顯示師承法在當時並未獲得普遍的認同；然而，進入清代之後，毛奇齡（1623—1716）、朱彝尊（1629—1709）等人亦以此法辨豐坊之僞，其後師承法在清代三家《詩》輯佚的版圖中，則成了無往不利的工具。關於師承法的後續發展，下文將會有更清楚的討論。

#### 4. 輯佚及考據

明代雖無輯佚漢三家《詩》的專著，但並非對《詩經》相關的輯佚毫無關注。大體而言，關於《詩經》的輯佚工作，明人都集中在逸詩的部分，如楊慎（1488—1559）的《風雅逸篇》<sup>[77]</sup>、周應賓《九經逸語》<sup>[78]</sup>、沈萬鈞《詩經類考》等書<sup>[79]</sup>，都有輯佚逸詩的成果<sup>[80]</sup>；而陳士元（1516—1597）《五經異文》、周應賓《九經考異》<sup>[81]</sup>、何楷《詩經世本古義》等書，則輯出許多與《毛詩》不同

的異字<sup>[82]</sup>；此外，上述楊慎除了輯佚詩以外，猶歷引漢人《詩》說，善用《韓詩》、《易林》、《齊詩》、《說文》等中的《詩經》異文，以解決《詩經》中的疑難<sup>[83]</sup>。

不論是輯佚逸詩，或是留意《詩經》異文，這些作法，實與王應麟在《詩考》中的取向雷同。前文已述，王氏《詩考》一書，除了輯佚三家《詩》外，還附帶輯了先秦兩漢諸書中的逸詩，以及《毛詩》以外的異字異義，而明代學者對於逸詩及異文的重視，均與王氏《詩考》一書的關懷相近；明人董斯張（1586—1628）則直接對王氏《詩考》進行補遺的工作<sup>[84]</sup>，其承接王氏之脈絡，極爲明顯。諸人雖未正式進入三家《詩》的輯佚大業，但至少可證明王氏此書的影響，並未消失。

值得一提的是，孫穀著有《古微書》<sup>[85]</sup>，首開專輯漢代緯書之風。是書中有兩卷的篇幅，特別輯佚《詩經》的緯書，分別是《詩含神霧》、《詩推度災》、《詩汎歷樞》三書，此三書與好談陰陽災異的《齊詩》關係密切。王應麟輯佚三家《詩》時，《齊詩》的蒐尋極難，因爲《齊詩》亡佚最早，且在史傳中僅遺蛛絲馬跡，是以難度頗高<sup>[86]</sup>，因此，孫氏此書，無異爲日後的輯佚者開了一扇極爲重要的大門，彷彿使得《齊詩》有重現的可能，故此書對清人影響極大，下文將會有較詳細的敘述。

本節所論及關於明人輯佚的狀況，實乃明代輯佚史上的冰山一角。事實上，明代因刻書業發達，兼以當時有蒐集遺書之風，是以對罕見、神秘或失傳已久的古籍，特別感到興趣，故明人對於輯佚遺書的需求，不論是在學術上，或是在書籍市場上，都有一定的程度；正因如此，相較於其他的朝代，明代奇書、遺書層出不窮，琳琅滿目，別具特色。但在如此多元斑斕的書市中，自然也因而有真假難辨、水準參差的著作混入其中，挾著刻書市場的興盛，加上大部分的讀者未必有能力辨別真僞，僞作暢銷風行者亦所在多有，如《竹書紀年》、《十六國春秋》之類，其中真僞雜錯，考訂未密，草率成書，不明出處，疏漏之處極多<sup>[87]</sup>；而上節

所論豐坊之作亦是一例。豐氏之書，以秘藏為名，行造偽之實，倘真假不辨，則其書在明代學術史上，亦可視為類似輯佚的重要成就。

要之，明人輯佚之整體水準雖然並不算太高，但却極富啟發性，此後清人之輯佚，不論是在面向的廣度上，或是精準的深度上，都有相當好的發展，也許明人所扮演的角色，正是一不計成敗的冒險拓荒者吧。

#### 四、清代三家《詩》輯佚的興起

西漢三家《詩》屬今文經學，陸續亡佚之後，在《詩經》學史的研究中，幾乎一直處於不受重視，或說是無法重視的情況，因為原典不存，無法從事進一步的研究。但自南宋王應麟輯《詩考》以來，三家《詩》的研究露出一線曙光，明人雖無輯佚三家的專著，但如上節所述，明代學者在不同面向的努力，對後世極具啟迪的作用。清初官學一尊《朱傳》，部分學者轉而崇漢學，但主要以《毛傳》、《鄭箋》為主，其後崇漢學的勢力漸大，三家《詩》才受到較多的關注<sup>[88]</sup>。然在此尊朱、崇毛，乃至後來受到關注的過程中，一直都有清代學者承接著明人立下的基礎，繼續拓展三家《詩》的輯佚與研究空間。這些學者的《詩》學立場，雖未必尊揚三家，但同樣為三家的輯佚作出貢獻。本節旨由輯佚方法的觀點切入，論述師承法的崛起、辨偽的刺激、輯佚風潮等議題，冀能說明清代學術如何承接明人成果，並進一步開展，甚至衍成三家《詩》輯佚盛興的局面。

##### 1. 師承法的崛起

進入清代，漢三家《詩》說的輯佚大放異彩，其中主要的原因之一，即輯佚方法的開拓。前文曾云，清代三家《詩》輯佚的首要著作，便是范家相的《三家詩拾遺》，此書與南宋王應麟《詩考》最大的不同，便是運用漢人師承的觀念，大量網羅了學術傳

授系譜中的諸人《詩》說，以為三家《詩》的內容，同時藉著其傳授關係，還可進一步分別家數，故所輯的各家內容頓時豐富許多，此即師承法的運用成果。因此，清代的三家《詩》輯佚成績之所以如此豐碩，師承法的使用，實具關鍵性的因素。

若我們仔細檢視師承法，不難發現形成此法的兩個重要成因，一為漢人學術傳授的系譜，另一則為漢人《詩》說的內容。此二因素，猶如人的骨架與血肉的關係。清楚地說，學術傳授系譜，好似一個人的基本骨架；而散逸於典籍中的《詩》說，便似人的血肉，將散逸的血肉依骨架歸位填補，便完成了人形，也就成了清人輯佚的師承法。

在探討清人運用師承法的議題前，筆者擬先回溯明人對此法的貢獻。首先，就學術傳授系譜而言，前文提及明人朱睦㮮著《授經圖》以明漢人經學之傳授關係，不但作圖標示如樹枝狀的世代繁衍情況，還在其後節引圖中學者的傳略，以明其人學行，提供了重現三家《詩》學術發展體系的重要線索。此一概念，著實啟發了清代的學者，清人朱彝尊《經義考·承師卷》、洪亮吉(1746—1809)《傳經表》等<sup>[89]</sup>，均繼承了此一觀念，其中尤以洪氏的《傳經表》為集大成之作。其書自序云：

六經權輿于孔子，六經之師亦權輿於于孔子。《易》，孔子十五傳至劉軼；《尚書》，家學二十一傳至孔昱；《詩》，《魯》十五傳至許晏，《毛》十六傳至賈逵；《春秋經》，《左氏》十九傳至馬嚴，《公羊》十三傳至孫寶，《穀梁》十一傳至侯霸；佗若今文《尚書》，伏勝十七傳至王肅；《齊詩》轅固七傳至伏恭；《韓詩》韓嬰六傳至張就；《禮》高堂生六傳至慶咸。上自春秋，迄於三國，六百年中，父以傳子，師以授弟，其耆門高義，開門授徒者，編牒不下萬人，多者至著錄萬六千人，少者亦數百人，盛矣！降自典午，則無聞焉，豈非孔氏之學，專門授受，逮孫炎、王肅以後，始散絕乎？暇日采綴群

書，第其本末，校正謬漏，作《傳經表》一卷，其師承無可考者，復以《通經表》一卷輟（綴）之，而通二經以上至十數經者，咸附錄焉，較明朱睦㮮《授經圖》、國朝朱彝尊《經義考·承師》所錄，詳實倍之，蓋周秦漢魏經學授受之原，至此乃備也。乾隆四十六年歲在辛丑八月望日陽湖洪亮吉序。<sup>[90]</sup>

依此序文，洪氏意圖備全周秦漢魏經學授受之原，唯洪氏之書，化圖為表，且無學者傳略，故其目的僅明各經之傳授而已，與朱睦㮮兼明其人學行之意略有所別。前云范家相《三家詩拾遺》書前列有《三家詩源流》一卷，其意亦在表明諸人之學術傳授脈絡，范書作於乾隆廿五年（1760），洪書作於乾隆四十六年（1781），范書有傳無表，洪書有表無傳，其後陳喬樞、魏源輯三家《詩》，皆於書前卷首，詳列各家師承授受，大抵亦以史傳內容為主，不立圖表，一如范氏之作。要之，諸人之作法雖有不同，然其受朱氏啟發，重師承傳授之概念則一，而當時之學術氛圍亦因是而漸進形成。

其次，就漢人《詩》說的內容而言。前文曾論述明代中葉以後，部分學者留意毛、鄭以外的漢人《詩》說，雖未必分判家數，但其中不乏有意兼輯三家《詩》說的學者，即使部分學者無意輯三家說法，但廣覽毛、鄭以外的漢人《詩》說，對於清代留意於三家《詩》的學者而言，此舉本身便是一相當重要的訊息。《韓詩》的《薛君章句》及劉向的《列女傳》，是在南宋王應麟時便已受到注意的三家遺說，但如劉向《新序》、《說苑》，蔡邕《琴操》、《獨斷》，鄭玄三《禮》注、《易林》，桓寬《鹽鐵論》，揚雄《法言》等書，雖在宋人的《詩》學著作中，亦偶有引述，但在明人的論著中，却是廣泛地申引諸書中的《詩》說，使讀者憶起毛、鄭以外的三家說法，很可能便含藏其中，繼而根據該書作者的學術傳授系譜，再推斷其說可能承自三家中的某家，如此一來，傳授系譜加上漢

人眾多著作中的《詩》說，便可大量重現三家遺說的內容了。

清代自范家相以降，學者大量運用漢代經學傳授關係，網羅三家《詩》學系統的學者說法，並將之歸類分派，此一藉師承法而來輯佚內容，使三家《詩》的輯佚進入了新的里程碑。追本溯源，明代對經學傳授系譜的重視，以及大量蒐羅漢人《詩》說的做法，可說是為師承法的運用作了極佳的準備與啟迪，此後師承法崛起、盛行，明人實功不可沒。

然而，對於師承法的運用，清人則有不同的態度。以范家相而言，使用時尚稱謹慎，對於難分家數之漢人說法，則泛屬三家，並不強加分判。至於阮元、陳喬樞、魏源、馮登府、王先謙等人，則大多明分家數，強予歸類，致使各家分法不同，問題叢生，同一漢代學者，同一漢人著作，但却被分成不同的家數，令讀者無所適從。爭議最多者，莫過於鄭玄三《禮》注、班固《漢書》、《白虎通》，以及桓寬《鹽鐵論》等。葉國良先生在《〈詩〉三家說之輯佚與鑒別》一文中，便詳細討論此一問題，茲引數例以明之<sup>[91]</sup>。

例如鄭玄三《禮》注，范家相以為康成未箋《毛傳》時，其注三《禮》，多用《魯詩》，兼出《齊》、《韓》，故泛屬三家<sup>[92]</sup>；但魏源則據鄭玄箋《詩》之前，曾從張恭祖受《韓詩》，遂以為應屬《韓詩》<sup>[93]</sup>；而陳喬樞却認為，鄭玄本治小戴《禮》，注《禮》在箋《詩》之前，《禮》家師說均用《齊詩》，鄭君據以為解，故應屬《齊詩》<sup>[94]</sup>。同樣是論鄭玄的三《禮》注，却有三家、《韓詩》、《齊詩》等三種不同的說法，師承法所衍生的問題，由是可見一斑。

再看班固《漢書》與《白虎通》。先看范家相的說法。其文云：

班固《白虎通》多引《韓詩內傳》，亦時述《魯詩》，《漢書》亦然，蓋三家《詩》俱有之。<sup>[95]</sup>

家相以班固之《漢書》與《白虎通》中引《詩》處，有《韓詩》，亦有《魯詩》，故不應僅限於某家，而宜泛歸之三家以統稱之。但陳

喬樞則不這麼認為,其《齊詩遺說考·自序》云:

《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班固之從祖伯,少受《詩》於師丹,誦說有法,故叔皮父子世傳家學。《漢書·地理志》引“子之營兮”及“自杜沮漆”,竝據《齊詩》之文;又云“陳俗巫鬼,晉俗儉陋”,其語亦與匡衡說《詩》合,是其驗已。<sup>[96]</sup>

陳氏據班固家學傳承,兼以《漢書·地理志》所引與傳《齊詩》的匡衡所說相合,故斷班固《漢書》所說為《齊詩》。

論及與班固關係密切的《白虎通》一書<sup>[97]</sup>,陳氏則不由班固的觀點切入。其《魯詩遺說考·自序》曰:

後漢建初四年……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制臨決,如孝宣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今於《白虎通》引《詩》,皆定為魯說,以當時會議諸儒如魯恭、魏應皆習《魯詩》,而承制專掌問難,又出於魏應也。<sup>[98]</sup>

陳氏論《白虎通》引《詩》時,則由承制者魏應所習之《詩》家論之,完全不考慮班固。

同樣是論《漢書》與《白虎通》,馬國翰(1794—1857)的考量點與陳喬樞則互有同異。其《齊詩傳》序曰:

考班固作《漢書·叙傳》,述其家學云:“伯少受《詩》於師丹”,固父彪為伯弟穉之子,固其從孫也。班固世傳齊學,故《地理志》引用《齊詩》,由此推之,凡《漢書》中除紀傳所載詔、策、疏、奏之類,各錄本文外,表、志、贊、叙,出於班氏父子手筆,所引皆《齊詩》無疑也。<sup>[99]</sup>

又曰:

《後漢書·班固傳》云: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今《白虎通》引《詩》,有《魯訓》、

《韓內傳》,其引《詩》不言何家者,以齊為本,故不復顯其姓名也。<sup>[100]</sup>

馬氏判斷班固《漢書》引《詩》屬《齊詩》的理由,與陳喬樞完全相同;但論及《白虎通》一書,則與陳喬樞有很大的差異,其論《白虎通》,亦以班固家學為由,仍以《齊詩》視之。

類似的情況,猶存在於桓寬《鹽鐵論》等書之中<sup>[101]</sup>,茲不贅舉。僅列簡表明之。

|          | 王應麟  | 范家相  | 阮元   | 陳喬樞 | 魏源   | 馮登府  | 王先謙 |
|----------|------|------|------|-----|------|------|-----|
| 班固《漢書》   | 三家   | 魯(韓) | 魯    | 齊   | 魯    | 魯    | 齊   |
| 鄭康成三《禮》注 | 韓(魯) | 韓    | 魯(齊) | 齊   | 韓(魯) | 韓(魯) | 齊   |
| 《白虎通》    | 韓    | 魯(韓) | 魯    | 魯   | 魯    | 魯    | 魯   |
| 桓寬《鹽鐵論》  | 三家   | ?    | 魯    | 齊   | 三家   | 魯    | 齊   |

由是可見,以師承法蒐羅漢代三家《詩》說並判分家數的作法,確實會產生相當多的爭議,而且,漢人是否真如清代學者所認為的固守師法,不創異說,其實仍有很大的商榷空間<sup>[102]</sup>。清代輯佚三家《詩》的工作,因為師承法的加入,成果豐碩,但也爭議不斷。故就清代三家《詩》的輯佚而言,功在師承法,過亦在師承法。

## 2. 辨偽的刺激

明末因豐坊偽書造成的風波,辨偽者陸續使用各種方法戳破豐坊諸書的謊言,其中陳元齡採用了師承法,以劉向《列女傳》等書說《詩》處與之對照,發現全然不合,於是斷豐書為偽作。陳元齡的作法,指出了藉師承法蒐尋三家《詩》遺說,即可辨偽。進入清代以後,群經均有類似的辨偽情況,因而形成了一股辨偽的風氣<sup>[103]</sup>。其中,關於《詩經》的部分,以毛奇齡、朱彝尊二人的辨偽最為重要。毛奇齡著成《詩傳傳說駁義》一書,以各個不同的層面考辨《子貢詩傳》與《申培詩說》之偽,其中亦用

了劉向《列女傳》等著作中說《詩》的部分，並視之為《魯詩》之遺說<sup>[104]</sup>，此一作法，顯然承自於明人陳元齡。

而朱彝尊《經義考》亦以《魯詩》遺說辨偽，其文曰：

楚元王受《詩》於浮邱伯，劉向，元王之後，故《新序》、《說苑》、《列女傳》說《詩》皆依《魯故》，其義與《毛傳》不同，而豐氏本無與諸書合，是未詳《魯詩》之義也。<sup>[105]</sup>

毛、朱二人以《魯詩》遺說辨偽的方法，實與陳元齡無異。此法雖說即師承法之雛形，但除了劉向著作之外，並沒有再發展出其餘的《魯詩》諸家說法以供對照，換言之，從明人陳元齡，到清初的毛奇齡、朱彝尊等人，其所用以辨偽的師承法，僅止於最初階段的階段。而真正發展此法，並正式以輯佚方式呈現各家遺說的人，是范家相。

豐坊偽書的辨偽工作，至毛、朱二人已告一段落，鐵案如山，不必再辯。然而，在辨偽中運用的方法，却有了進一步的開展。家相之學，源出於毛奇齡<sup>[106]</sup>，奇齡以師承法辨偽，家相却利用師承法，以輯佚的方式，具體呈現三家《詩》說的真實樣貌，使得三家《詩》說不再虛構，無法偽造。師承法自是大量被運用於各家《詩》說的蒐羅工作，不再僅限於劉向《列女傳》等書。

在清初的辨偽風氣之後，輯佚古書的潮流繼起，大行其道，下文將有論述，本節僅就辨偽的影響而論。辨偽與輯佚，二者本屬相輔相成的工作，以輯佚之法考辨偽書，本就是一極有效且可靠的方法<sup>[107]</sup>。清初的辨偽風氣，與之後接踵而至的輯佚潮流，如此的關聯情形，實不能說輯佚與辨偽毫無關係。以三家《詩》輯佚方法的發展來看，其實更應說是辨偽刺激了輯佚的工作。豐坊因當時對三家《詩》的學術需求而造偽，陳元齡、毛奇齡、朱彝尊等人因偽書而辨偽，又因辨偽而運用了師承法，范家相承接此法而輯佚三家《詩》，同樣亦是回應學術上對三家《詩》的需求。此一需求在豐坊時便已存在，此後亦未停歇，只是礙於書籍

亡佚，無法得見，而輯佚方法的突破，便成了主要的關鍵。師承法之所以會在清代崛起，被大量運用，上文所述明人在學術傳授系譜以及對漢人《詩》說的重視，屬此法興起之內緣因素，而明末清初對豐坊偽書的辨偽工作，則扮演了重要的外緣角色，臨門一脚地刺激著此法的開展，使此法在辨偽的工作之外，被賦予了更重要的新任務，並且不斷繁衍出其他相關的方法，如推臆法等。辨偽的刺激力道，對於清代三家《詩》輯佚的興起，不容略過。

### 3. 輯佚的風潮

衆所周知，有清一代輯佚古書的成績，是歷來最耀眼的，沒有任何一個朝代可以凌駕其上。而清人輯佚之所以盛行，最重要的原因應與乾隆修《四庫全書》有關。乾隆修書之時，設了纂修官，專輯《永樂大典》中唐、宋、元等古佚書，此舉積極推動了清代輯佚事業的發展<sup>[108]</sup>。然而在此之前，已有學者致力於蒐集古經傳注，如嚴虞惇（1650—1713）、惠棟（1697—1758）、余蕭客（1729—1777）等人。然惠棟大體以漢《易》為主，沒有三家《詩》相關著作；而嚴虞惇、余蕭客雖涉及三家輯佚，但篇幅極少；至於康熙時官方所輯之《全唐詩》、《全金詩》、《後漢書補逸》等，亦可稱為此期的代表作。當然，與本文議題相關且最重要者，則非范家相《三家詩拾遺》莫屬，范書亦成於乾隆修書之前<sup>[109]</sup>，稍後還有盧文弨（1717—1795）、嚴蔚、胡文英等人，為王應麟《詩考》一書作了校注、異補等工作，而趙懷玉（1747—1823）、周廷案亦為《韓詩外傳》作校注與補逸<sup>[110]</sup>。諸書雖與輯佚不盡相同，但三家《詩》整理的相關工作，却已悄然拉開了序幕。

事實上，真正的輯佚風潮，應屬乾隆末年到嘉、道之間，此時民間的輯佚大家輩出，輯佚成果盛況空前<sup>[111]</sup>。三家《詩》輯佚的重要著作亦在此期大量湧現，如臧庸（1767—1811）輯《韓詩遺說》<sup>[112]</sup>、阮元輯《三家詩補遺》<sup>[113]</sup>、陳壽祺、陳喬樞父子輯《三家詩遺說考》<sup>[114]</sup>、魏源作《詩古微》<sup>[115]</sup>、馮登府作《三家詩異文

疏證》、《三家詩遺說》<sup>[116]</sup>等，皆在此時。此外，汪鶴壽（1773—？）《齊詩翼氏學》，馬國翰《齊詩傳》、《韓詩故》、《韓詩說》、《韓詩內傳》，黃奭（1810—1853）《魯詩傳》、《齊詩傳》、《韓詩內傳》，陳喬樞《齊詩翼氏學疏證》、《詩經四家異文考》，丁晏（1794—1875）《詩考補注》，陳士珂《韓詩外傳疏證》，吳棠（？—1876）《韓詩外傳校注》，宋綿初《韓詩內傳徵》<sup>[117]</sup>等，諸書均為三家《詩》輯佚之相關著作，著實使得三家《詩》的研究，蔚為大觀。

要說明的是，輯佚三家者，《詩》學立場未必一致，或有揚毛以抑三家者<sup>[118]</sup>，或有揚三家以抑毛者<sup>[119]</sup>，亦有藉三家《詩》說以闡《春秋》微言大義者<sup>[120]</sup>，還有僅止於扶微學、廣異義者<sup>[121]</sup>。然而，不論諸人之立場為何，並不影響其輯佚的成果，亦即諸人輯佚三家的目標相當一致，也共同將三家《詩》的輯佚帶上歷史的高峰。

三家《詩》輯佚的大興，自然是此期輯佚風潮推波助瀾的結果。此風潮的由來，上述乾隆修書並輯《永樂大典》自是近因，然而，不少學者主張，承著明代“回歸原典”的運動<sup>[122]</sup>，以及學術史上“內在理路”的發展之說<sup>[123]</sup>，甚至是政治經濟上的複雜因素<sup>[124]</sup>，更應是此一風潮的遠因。諸家所言，在近年學界的討論中，屢見稱引，自有不刊之價。值得注意的是，有部分學者認為，常州今文學派的興起，亦直接推進了三家《詩》今文研究的復興<sup>[125]</sup>。

三家《詩》輯佚與研究的風潮既起，今文《詩》學亦由是形成一股不可小覷的力量。然而，在實際的輯佚工作中，能否有好的成績，端視其學術議題內在的歷史積累，也就是說，如果没有前人鋪路作基礎，光靠清人的努力，恐怕還要更長的時間，才能有如此耀眼的輯佚成果；而所謂的學術風潮，雖說能造成較多的學者參與，但並不能保證整體或個別成績的好壞。以《齊詩》的輯佚來說，自來難度最高，且不說朱彝尊《經義考·愆緯》一門所

引<sup>[126]</sup>，據明人孫穀《古微書》者十之八九，而馬國翰、黃奭等人<sup>[127]</sup>，接連以緯書大量輯佚《齊詩》，就連陳喬樞輯《齊詩》，書中大量用的漢代緯書，得自於孫氏輯佚者亦極多，如此富麗的成果，若要溯源歸功，明人孫氏《古微書》實當之無愧。附帶一提，在三家《詩》異文的部分，明人何楷及楊慎等人對《詩經》中的異文多所留意，前文云陳喬樞作《詩經四家異文考》、馮登府作《三家詩異文疏證》等，則亦是此一範疇接續而有的成績。

要之，清人輯佚三家《詩》的成就非凡，非歷代所能及，但在耀眼的光環中，我們仍應正視明人其實默默耕耘已久，著實為清代的發展奠下了重要的根基。

## 五、結 論

明人的三家《詩》學，不以專著的方式出現，亦未形成一完整的體系，相關者或自覺涉入漢三家《詩》的範疇，或不自覺地引用三家《詩》說，然不論自覺與否，在宋到清之間三百多年的歲月中，明代中葉以後對漢代《詩》說的關注，以及重視漢人經學傳授系譜的情況，乃至豐坊造偽所透露的學術市場需求等，這些重要的現象，都隱隱牽動並啟發著日後的學術動向。

豐坊偽書的意義，特別值得一提。在不辨真偽的前提下，此書不但可視為明人類似輯佚三家《詩》的重要成果，更是明人三家《詩》學的重要著作。即使在辨偽之後，其過程亦刺激了方法的開拓，其中之一，即是輯佚三家《詩》的重要利器——師承法。

師承法由南宋王應麟的猶疑，到明陳元齡的肯定，清毛奇齡、朱彝尊的接續，再到范家相等人的大量運用，並再衍生出其他相關的輯佚方法。清人輯佚三家《詩》，藉著師承法，有了前代無法企及的成績，如果没有此法，三家《詩》的輯佚版圖，勢必難以開展，但其中也產生不少的問題，致使爭議不休，是功？是

過？師承法都需概括接受。

明人對緯書的輯佚，乃至以《詩經》異文考據的作法，在在都為清人的輯佚打下了重要的基礎。不論是明人回歸原典的運動，或是明清學術史上內在理路的發展，甚或是複雜的政治經濟因素，都使得乾隆後期輯佚風潮未起之前，清代的三家《詩》輯佚已悄然地開始；一旦輯佚風潮大起，研究三家《詩》的學者，不論其《詩》學立場為何，無不接續著前輩努力的成果，繼續耕耘，終使有清一代的輯佚，成就非凡。

清代三家《詩》輯佚的興起，因素複雜多端，不論內緣或外緣因素，都相當多重，牽扯萬方。歷來論清今文經學興起者，已不乏其人，但若單就三家《詩》的角度觀之，自應有不同的觀點，雖與其他學術因素相互牽動，但仍有其獨特之處。尤其是從學術內部的問題來看，重要觀點的醞釀、前人成果的累積、方法的嘗試與成熟，都是不可或缺的原因。本文所嘗試者，在於董理明人在三家《詩》學上的貢獻，認為其表面上似不成章，但內在實有其著力點，默然深耕著一塊荒蕪已久的園地，為日後立定基石。同時，也試著由《詩經》學的角度，思考清代今文經學的興起，冀能為明清學術的討論，提供獻曝之得。

(作者：臺灣中央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 注釋：

[1] 在范家相之前及與家相同時之學者，有嚴虞惇(1650—1713)、惠棟(1697—1758)、沈淑(1702—1730)、嚴蔚、余蕭客(1729—1777)等人，或零星輯佚三家《詩》之內容，或專輯《詩》之異文，然均非輯佚三家《詩》說之專著，故本文論清三家《詩》說之輯佚，自范家相始。關於清前期《詩經》異文輯佚之情況，

詳參陳致《清代詩經異文考釋研究》，《東方文化》第41卷第2期，2008，頁14—19。另按：范家相之生卒年，主要依據陳鴻森先生《清代學術史叢考》，《大陸雜誌》第87卷第3期，1993年9月，頁8，其中“范家相生卒年辨”條，論證“范氏於乾隆三十四年卒時，其年已過五十五矣”，依此斷定范氏卒年為乾隆三十四年(1769)，推測生年應為康熙五十四年(1715)之前。

- [2] 范氏著作之後，如臧庸的《韓詩遺說》、丁晏《詩考補注》、阮元《三家詩遺說》、陳壽祺及陳喬樞父子《三家詩遺說考》、魏源《詩古微》、馮登府《三家說異文疏證》、《三家詩遺說》等，均作於乾隆末年至道光年間。按：今人房瑞麗之博士論文，對於清三家《詩》輯佚之現象與內容，均有仔細的討論，詳參房著《清代三家詩研究》，復旦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2007年4月。
- [3] 一般認為，清代今文經學的開創者為莊存與，奠基者為劉逢祿，開展者為龔自珍及魏源，此即是由《公羊》學的角度切入；甚且有不少學者將今文經學之名，代以“公羊學派”、“常州學派”概括，詳參陸振岳《關於清代今文經學的幾個問題》，《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1期，頁92—98；李軍《論清代今文經學的創立復興及其思想特點》，《管子學刊》1998年第2期，頁31—38；羅檢秋《從清代漢宋關係看今文經學的興起》，《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1期，頁1—45；黃開國《清代今文經學的興起》，成都：巴蜀書社，2008年6月。按：陸文曾討論清代今文經學的內涵，應包括明經、注疏、輯佚、辨偽等，其中亦提及三家《詩》的輯佚，並認為研究清代的今文經學，不應僅止於關注常州公羊學派而已(頁94)，頗為有見。又按：論述清代常州今文學派興起的代表作，莫過於美國學者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的著作，詳參[美]艾爾曼著、趙剛譯《經學、政治和宗族——中華帝國晚期常州今文學派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
- [4] 關於明代學者與三家《詩》輯佚的關係，趙茂林《兩漢三家詩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6)及房瑞麗《清代三家詩研究》二書均有論及，值得參考。
- [5] 關於豐坊生卒年，並無明文記載，今依林慶彰先生考證。詳參林慶彰《豐坊與姚士粦》，臺北：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78年5月，頁16—20。
- [6] 宋王應麟《詩考·自序》，據《津逮秘書》本影印，《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首，頁1。按：文中“康衡”，應為“匡衡”，“匡”字因避宋太祖趙匡胤的諱，故以“康”字取代。
- [7] 所謂“直引法”，即某書的作者由於及見三家《詩》未亡佚時之原貌，便直接引

述三家《詩》原來的內容。

- [8] 宋王應麟《詩考·韓詩》，頁3—49。
- [9] 宋王應麟《詩考·魯詩》，頁50—53。
- [10] 宋王應麟《詩考·齊詩》，頁53—58。
- [11] 所謂師承法，即以漢代諸書作者的學術背景，如師承或家學等淵源，藉以推敲其人與三家《詩》的種種關聯，並進一步論斷其說應屬三家《詩》中的某一家；換言之，只要某人與西漢三家《詩》的某一《詩》派有學術上的關聯，便可連結至此一《詩》派的系統之下，此人所有關於《詩經》的作品或說法，便視為某一《詩》派的遺說。此一“師承”之說，當然包含西漢時的師法與家法，且清代學者採極廣義解釋，更擴大成只要有絲毫的學術關聯，便可歸入某一《詩》派。
- [12] 宋王應麟《詩考·後序》，頁128。
- [13] 宋王應麟《詩考·韓詩》，頁8。
- [14] 宋王應麟《詩考·齊詩》，頁54。
- [15] 王應麟在《詩考·後序》中對劉向家數的判斷，亦見於《漢藝文志考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7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是書云：“劉向之學，《魯詩》之流也”（卷二，頁3），“向乃元王之孫，必本於《魯詩》”（卷二，頁4）。顯而易見，《漢藝文志考證》對師承法的態度，已較《詩考·後序》肯定許多，而《詩考·後序》之主張，其實亦不見於實際的輯佚之中。依此推測，應麟輯三家《詩》時，對師承法相當質疑，直至書成作後序，始覺得此法似可運用，遂作《漢藝文志考證》，便肯定了師承法的價值。但本文僅就《詩考》一書中所呈現的輯佚現象及觀念論之，故對應麟之後的改變略而不談。
- [16] 宋王應麟《詩考·逸詩》，頁109—118。
- [17] 宋王應麟《詩考·詩異字異義》，頁58—108。
- [18] 清范家相《三家詩拾遺·三家詩源流》，據《守山閣叢書》本排印，《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首，頁1—4。
- [19] 清范家相《三家詩拾遺·文字考異》，卷一，頁1—19。
- [20] 清范家相《三家詩拾遺·古逸詩》，卷二，頁21—37。
- [21] 皮錫瑞《經學歷史》，北京：中華書局，1989，頁283。
- [22] 林慶彰《晚明經學的復興運動》，收入《明代經學研究論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頁79—145。按：本文構思過程，受到林先生此書極多的啓發，特此誌謝。
- [23] 楊晉龍《明代詩經學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97年6月。
- [24] 林慶彰《晚明經學的復興運動》，頁81。按：林先生長期研究明代學術，對此一問題著墨尤多，且不掠前賢之美，認為其文適足以證成胡適、稽文甫、余英時等人的類似論點。
- [25] 如劉毓慶《明代〈詩經〉“漢學”研究論略》，《荊州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3期，頁13—16。
- [26] 林慶彰《明代的漢宋學問題》，收入《明代經學研究論集》，頁1—31。
- [27] 如呂柟、袁仁、郝敬等人，詳參楊晉龍《明代詩經學研究》，頁256—266。
- [28] 明代自洪武十七年以來，《朱傳》一直是官方的唯一標準，而永樂時頒定的《詩傳大全》，更是以發明《朱傳》的諸家解說為主，故在明代中葉以前，即使有學者提出反《朱傳》的說法，相較於絕大多數為功令所引導的士子而言，其人數實為鳳毛麟角。參楊晉龍《明代詩經學研究》，頁221—225。
- [29] 劉毓慶《明代〈詩經〉“漢學”研究論略》，頁13。
- [30] 明朱陸樛《五經稽疑》，《四庫全書珍本》初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第90冊，卷三，頁2—3。
- [31] 漢毛亨傳、鄭玄箋《毛詩鄭箋》，臺北：新興書局，1993，卷一，頁7。
- [32] 朱氏於是書自序云：“……因思古人實有慨於余心，乃取四經，時披閱焉。或有疑者，參訂諸家之說而折衷之，且述且作，得若干卷，雖不敢比跡昔賢，然鬱伊之感，庶幾同焉。”（見明朱陸樛《五經稽疑》，卷首）
- [33] 明黃道周《榕壇問業》，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4）第717冊，卷六，頁13（總頁717—338）。
- [34] 明胡紹曾《詩經胡傳》，影印明崇禎十六年（1643）胡氏春煦堂刻本，《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壹輯肆冊，卷二，頁2（總頁壹輯4—364）。
- [35] 明胡紹曾《詩經胡傳》，卷二，頁6（總頁壹輯4—366）。
- [36]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注疏·坊記第三十》（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頁866—1。
- [37] 宋王應麟《詩考·魯詩》，頁51。
- [38] 明胡紹曾《詩經胡傳》，卷二，頁31—32（總頁壹輯4—378—379）。

- [39] 宋王應麟《詩考·齊詩》，頁54。
- [40] 明何楷《詩經世本古義》，《四庫全書珍本》四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第36冊，卷八，頁4—5。
- [41] 漢劉向撰、清梁端校注《列女傳校注》，《四部備要》本，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1，卷二，頁45。
- [42] 何楷於是書卷首云：“近世又有偽為《魯詩》而託之子貢傳者，意覲與《毛傳》並行，然掇拾淺陋，有識哂焉。”詳參《詩經世本古義》，《四庫全書珍本》四集第35冊，卷首，頁6。
- [43] 關於《易林》一書的作者，歷來有焦贛與崔篆二人之說，今依葉國良先生之考證，以此書應成於崔篆之手。詳參葉著《〈易林〉作者作時問題重探》，《經學側論》（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頁1—35。
- [44] 明何楷《詩經世本古義》，《四庫全書珍本》四集第37冊，卷十二，頁9。
- [45] 按：是詩原名“甫田”，屬《齊風》。何氏更其詩名。
- [46] 明何楷《詩經世本古義》，《四庫全書珍本》四集第40冊，卷二十，頁19。
- [47] 按：揚雄此段文字出自《法言·修身》。參漢揚雄著、汪榮寶義疏、陳仲夫點校《法言義疏》，《新編諸子集成》（北京：中華書局，1987）第一輯，卷三，頁94。
- [48] 《四庫全書總目》云：“……故有元一代之說《詩》者，無非《朱傳》之箋疏。至延祐行科舉，遂定為功令。而明制因之，（胡）廣等是書，亦主於羽翼《朱傳》，遵憲典也。”詳見清永瑆等編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十六·詩類二·詩經大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頁314。
- [49] 皮錫瑞《經學歷史》，頁75—77。
- [50] 明費密《弘道書》，影印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民國九年大蘭唐氏怡蘭堂刻本，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儒家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946冊，頁21（總頁14）。
- [51] 明朱睦㮮《授經圖·序》，據《惜陰軒叢書》本排印，《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第269冊，卷首，頁1。
- [52] 宋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第73冊，卷一，頁24—26。
- [53] 明季本《詩說解頤》，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第79冊，卷二，頁10—13。
- [54] 明豐坊《魯詩世學·序》，影印天津圖書館藏清鈔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詩類》（臺南：莊嚴出版社，1997）第60冊，卷首，頁2（總頁60—629）。
- [55] 明豐坊《魯詩世學·國風·周南·關雎·考補》，卷一，頁12—13（總頁60—693）。
- [56] 參王學泰《明代〈詩〉學偽作與〈魯詩世學〉》，《文學遺產》1999年第4期，頁94—95。
- [57] 詳參林慶彰《豐坊與姚士舜》，頁83—84。
- [58] 詳參林慶彰《豐坊與姚士舜》，頁42。
- [59] 詳參林慶彰《豐坊與姚士舜》，頁100。
- [60] 歷來論《申培詩說》之作者，分為兩派，一主豐坊作，如朱彝尊、姚際恒、《四庫提要》等；一主王文祿作，如姚士舜、胡震亨、余嘉錫等。參林慶彰《豐坊與姚士舜》，頁116—117。
- [61] 清姚際恒《古今僞書考》，據《知不足齋叢書》本排印，《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5。
- [62] 詳參林慶彰《豐坊與姚士舜》，頁190—195；楊晉龍《明代詩經學研究》，頁266—275。
- [63] 劉毓慶便曾提到陽明心學對明代《詩經》學的發展有積極的影響，詳參劉著《陽明“心學”與明代〈詩經〉研究》，《齊魯學刊》2000年第5期（總第158期），頁52—57。
- [64] 明豐坊《魯詩世學·國風·周南·關雎·考補》，卷一，頁14—15（總頁60—694）。
- [65] 關於豐坊與季本之爭論，詳參劉毓慶《季本、豐坊與明代〈詩〉學》，《中國文學研究》2003年第3期（總第70期），頁48—49。
- [66] 必須說明的是，豐坊雖然批評朱子的“淫詩”說，但並非反對《朱傳》的所有說法，這由《子貢詩傳》中屢襲《朱傳》之說便可知。
- [67] 漢班固《漢書·藝文志》（臺北：鼎文書局，1983），卷三十，頁1708。
- [68] 王學泰《明代〈詩〉學偽作與〈魯詩世學〉》，頁93。
- [69] 依漢班固《漢書·楚元王傳》：“（元王）名交，……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伯者，孫卿門人也。”（卷三十六，頁1921）故申公的學術源頭應為荀子，而非子貢。不過，荀子雖屬儒家，但若與孔子的及門弟子子夏相較，其正統性自然遠遠不及，故豐坊便以子貢作為盟主，藉此與子

夏相抗衡。

- [70] 當時確有學者將《子貢詩傳》與相傳為子夏所作的《詩序》合刻,如郭子章與人合刻《二賢詩傳小序》、李維楨刻《二賢言詩》、凌濛初刻《聖門傳詩嫡冢》等。詳參林慶彰《豐坊與姚士舜》,頁190—194。
- [71] 如姚應仁《詩述述》,篇目次序,全以《子貢詩傳》、《申培詩說》為本,而姚允恭作《傳說合參》,亦屬此類。林慶彰《豐坊與姚士舜》,頁194—195。
- [72] 王汎森先生論豐坊偽作《大學》石經時,亦認為豐坊對當時學界爭論不休的核心問題掌握得極為清楚,也充分瞭解人們在是非難明之下所能接受的證據為何,本文受王文啓發極多。詳參王著《明代後期的造偽與思想爭論——豐坊與〈大學〉石經》,《新史學》六卷四期,1995年12月,頁1—18。
- [73] 詳參林慶彰《豐坊與姚士舜》,頁56—87,91—116。
- [74] 明陳元齡《思問初篇·詩說》(據國家圖書館藏明天啓六年(1626)朱泰陽刊本影印,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1),卷三,頁6(總頁153—154)。
- [75] 明陳元齡《思問初篇·詩說》,卷三,頁7(總頁155)。
- [76] 明陳元齡《思問初篇·詩說》,卷三,頁7(總頁155—156)。
- [77] 楊慎《風雅逸篇》卷四有《逸詩句》,即是輯逸詩詩句,詳參楊著《風雅逸篇》,據《函海》本排印,《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四,頁23—26。
- [78] 周應賓《九經逸語·逸詩》,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影印,《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五經總義類》(臺南:莊嚴出版社,1997)經第150冊,頁14—18(總頁150—582~150—584)。
- [79] 沈萬鈞《詩經類考·逸詩考》,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影印,《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詩類》(臺南:莊嚴出版社,1997)經第62冊,卷二,頁1—11(總頁62—481~62—486)。
- [80] 林慶彰《晚明經學的復興運動》,頁113—131。
- [81] 詳參陳致《清代詩經異文考釋研究》,頁5—7。
- [82] 如何楷論《大雅·皇矣》,便引用《左傳》、《潘夫論》、《論衡》、《漢書》、《毛傳》、《鄭箋》、《說文》等書,詳參明何楷《詩經世本古義》,《四庫全書珍本》四集第36冊,卷九,頁32—33。
- [83] 劉毓慶《楊慎與〈詩經〉考據學》,《山西大學學報》2000年2月,第23卷第1期,頁5—9。林慶彰《楊慎的經學》,《明代經學研究論集》,頁159—165。
- [84] 董氏之補遺凡十九條,附於《津逮秘書》本《詩考》之後。詳參蔣秋華《王應麟的〈詩經〉學》,《開封大學學報》1997年第1期,頁116。
- [85] 明孫穀《古微書·詩緯》,據《墨海金壺》本影印,《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23—24,頁429—470。
- [86] 王氏於《詩考》一書中,共輯《韓詩》391條,《齊詩》及《魯詩》各13條,與《韓詩》相去遠甚,足見輯佚《齊詩》及《魯詩》之難度頗高。
- [87] 曹書杰《中國古籍輯佚學論稿》(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頁101—105。
- [88] 詳參寧宇《清代〈詩經〉學的發展階段及主要派別》,《泰山學院學報》第27卷第4期,2005年7月,頁50—54。
- [89] 詳參王正一《略論清人研究兩漢經學傳承的基本成就》,《成都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第21卷第6期,2007年6月,頁90—92。
- [90] 清洪亮吉《傳經表·序》,《洪北江(亮吉)先生遺集》(台北:華文書局,1969)第九冊,卷首,頁1—2。按:文中“輟”字,應為“綴”字之誤。
- [91] 詳參葉國良先生《〈詩〉三家說之輯佚與鑒別》,《國立編譯館館刊》9卷1期,1980年6月,頁99—103。
- [92] 清范家相《三家詩拾遺·三家詩源流》,卷首,頁4。
- [93] 清魏源著、何慎怡點校《詩古微·韓詩傳授考》(影印道光中刻二十卷本,長沙:嶽麓書社,1989),卷首,頁146。
- [94] 清陳喬樞《齊詩遺說考·自序》,據清光緒十四年(1888)南菁書院刊本重編影印,收入《皇清經解續編重編本》(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0),卷首,頁2(總頁4349)。
- [95] 清范家相《三家詩拾遺·三家詩源流》,卷首,頁4。
- [96] 清陳喬樞《齊詩遺說考·自序》,卷首,頁2(總頁4349)。
- [97] 劉宋范曄《後漢書·班固傳》云:“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臺北:鼎文書局,1981,卷四十下,頁1373)
- [98] 清陳喬樞《魯詩遺說考·自序》,據清光緒十四年(1888)南菁書院刊本重編影印,收入《皇清經解續編重編本》(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0),卷首,頁3(總頁4115)。按:魏源說法亦同於喬樞,詳魏著《詩古微·魯詩傳授考》,頁137—138。
- [99] 清馬國翰《齊詩傳·序》,據同治辛未年(1871)濟南皇華館書局補刻本影印,

- 《玉函山房輯佚書》(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卷首,頁2(總頁476)。
- [100] 同上註。
- [101] 詳參龍向洋《歷代齊詩輯佚述評》,《瓊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4期,頁75—77。
- [102] 詳參葉國良先生《師法家法與守學改學——漢代經學史的一個側面考察》,《經學側論》,頁209—237。按:葉文中強調,漢代政府與學官雖重師法家法,傾向守學,但學術上自然的分化與整合,却造成改學的事實,益以後漢兼經的風氣,學者旁通數家或兼融今古文的現象,極為常見。
- [103] 詳參林慶彰《清初的群經辨偽學》(臺北:文津出版社,1990)一書。
- [104] 詳參清毛奇齡《詩傳詩說駁義》,《四庫全書珍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第十集第25冊,卷二,頁6。
- [105] 清朱彝尊《經義考·豐氏坊魯詩世學》,卷一一三,頁604。
- [106] 《四庫提要》云:“家相之學,源出蕭山毛奇齡。奇齡之說經,引證浩博,喜於詰駁,其攻擊先儒最甚,而盛氣所激,出爾反爾,其受攻擊亦最甚。家相有戒於斯,故持論一出於和平,不敢放言高論……在近代說《詩》之家,猶可謂瑜不掩瑕、瑕不掩瑜者也。”(詳見清范家相《詩澹》,書前提要,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首,頁1—3。)
- [107] 參曹書杰《略述宋明清時期的輯佚研究》,《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6期(總第176期),頁31—32。葉樹聲:《論清儒輯佚》,《淮北煤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1期,頁145。
- [108] 曹書杰《中國古籍輯佚學論稿》,頁131。
- [109] 范家相《三家詩拾遺·自序》云:“乾隆庚辰四月長至後十日,會稽范家相自序。”按:庚辰即廿五年(1760),乾隆修《四庫》在三十七年(1773),故范書成於乾隆修書之前。
- [110] 詳俞詒庭:《清三家《詩》輯佚成就略述》,《唐都學刊》第22卷第2期,2006年3月,頁1。
- [111] 張升《論清代輯佚興盛的原因》,《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4年第5期,頁28—30。曹書杰《中國古籍輯佚學論稿》,頁131。趙秉忠、白新良《清代前期的輯佚書活動》,《清史新論》(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2),頁154—163。
- [112] 依陳鴻森先生考訂,臧氏此書輯成於乾隆五十八年。詳參陳著《臧庸年譜》,北京清華大學歷史系編纂《中國經學》(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第二輯,頁268。
- [113] 依葉德輝《阮氏三家《詩》補遺叙》透露,阮元此書蓋六十以後之作。詳參清阮元《三家詩補遺》,光緒戊戌(24年)長沙葉氏師園重刊,《叢書集成續編》(臺北:新文豐事業有限公司,1989)文學類第110冊,卷首,頁5。
- [114] 陳壽祺、陳喬樞輯《三家詩遺說考》,三書之成書時間並不相同,《魯詩遺說考》成於道光十八年(1838)(是書自序云:“時道光十有八年戊戌秋九月。福州陳喬樞序於蕙修蘭實之齋”,卷首,頁4a,總頁4115),《韓詩遺說考》成於道光二十年(1840)(是書自序云:“時道光二十年,歲在庚子,侯官陳喬樞叙於京都城南之虎坊橋試館”,卷首,頁3a,總頁4488),《齊詩遺說考》成於道光廿二年(1842)(是書自序云:“時道光二十有二年,孟夏初吉,侯官陳喬樞叙於仙谿金石書院之講堂”,卷首,頁3a,總頁4350)。
- [115] 魏源《詩古微》之二刻本成於道光二十年(1840)。詳參賀廣如《魏默深思想探究——以傳統經典的詮說為討論中心》,《臺灣大學文史叢刊》,臺北:臺灣大學文學院,1999,頁84—87。
- [116] 馮登府《三家詩異文疏證》作於道光十年(1830),《三家詩遺說》作於道光廿一年(1841)。詳參賀廣如《馮登府的三家《詩》輯佚學》,頁308—309。
- [117] 詳俞詒庭《清三家《詩》輯佚成就略述》,頁86;寧宇《清代《詩經》學的發展階段及主要派別》,頁54。
- [118] 如范家相便是一例。詳參賀廣如《范家相《三家詩拾遺》及其相關問題》,《漢學研究》22卷1期,2004年6月,頁219—251。
- [119] 如馮登府即是。詳參賀廣如《馮登府的三家《詩》輯佚學》,頁324—327。
- [120] 如魏源即是。詳參賀廣如《魏默深思想探究——以傳統經典的詮說為討論中心》,頁104—155。
- [121] 如臧庸即是,臧庸廣輯群書,成果斐然,對於三家《詩》並無特定之立場,其輯佚時所採用之方法,極為謹慎,大多亦用直引法所得之可靠遺說,與他人大量運用師承法不同。詳參陳鴻森《韓詩遺說補遺》,《大陸雜誌》第85卷第4期,1992年10月,頁1—19;《臧庸年譜》,頁247—315。
- [122] 林慶彰《晚明經學的復興運動》,收入《明代經學研究論集》,頁113—131。
- [123] 余英時《從宋明儒的發展論清代思想史——宋明儒學中知識主義的傳統》,《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頁87—119。
- [124] 張升《論清代輯佚興盛的原因》,頁28。按:張文主要指當時的“反滿”因

素，並認為此說來自章太炎，其後梁啟超、侯外廬繼成其說。

[125] 房瑞麗認為，清代三家《詩》研究形成的外部環境主要有三：一是統治者積極的文化政策，二是四庫館臣的推許，三是常州今文學派的興起。其中房氏特別指出：“在常州學派興起的乾嘉後期，三家《詩》的搜討輯佚研究局面也已形成，范家相、陳壽祺都有很重要的三家《詩》著作，他們的著作和常州今文學派相互發明，相互影響，相互滲透。故常州學派大師劉逢祿後期的《詩經》研究一變而為尊三家，其繼承者魏源的今文研究《詩古微》中，則在發揮今文大義的時候很重視借鑒三家的輯佚成果，注重考證。所以說常州今文學派的興起，直接推進了三家《詩》今文研究的復興。”詳參房著《清代三家詩研究》，頁16。按：筆者認為，與其說常州今文學派影響了三家《詩》今文研究的復興，毋寧說是三家《詩》研究影響了常州今文學派的發展，因為清代輯佚三家《詩》的學者，除了魏源以外，其餘諸人並不涉及《公羊》學微言大義的說法，但常州學派的學者，却明顯隨著三家《詩》輯佚的漸興，改變其《詩》學立場，亦即由尊《毛詩》，轉為尊三家《詩》。而魏源雖非常州人，但一般視為常州學派後學，兼具常州學派與研究三家《詩》學者之身份，其論《詩經》時，秉持孟子“《詩》亡然後《春秋》作”一語，致力發揮隱藏於《詩經》中的微言大義，並透過三家《詩》的輯佚及論說將此一宗旨貫穿全書（詳參賀廣如《魏默深思想探究——以傳統經典的詮說為討論中心》頁104—155），這種將《詩經》《公羊》化的傾向，在其他家的輯佚著作中著實未見。而馮登府雖因受魏源影響，屢引其說，但情況却與魏源不盡相同，魏源以《春秋》大義為《詩經》宗旨的概念，並不見於馮氏書中，故魏、馮二人之情況，終不相侔。（詳參賀廣如《馮登府的三家《詩》輯佚學》頁331—333）

[126] 清朱彝尊《經義考·感緯》，卷263—267，頁1327—1352。

[127] 寧宇《清代《詩經》學的發展階段及主要派別》，頁50—54。

*Abstract:* The Studies of Three Schools of *Shijing*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Discussion on the Rise of the New Text of *Shijing* in the Qing Dynasty

Goang - ru Ho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Taiwan)

Most scholars studying *Shijing* have maintained that, since Wang Yinglin's *Shikao*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 collection and compilation of the lost texts of the Three Schools of *Shijing* Studies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did not hold public attention until the emergence of Fan Jiexiang's *Sanjiashi shiyi* in the Qing Dynasty. Even though no monograph had been published for the compilation of the lost texts of the Three Schools for more than three hundred years, however, there was an inclination for Han Learning in the Ming Dynasty, e. g., the emphasis of the discourses on *Shijing* and genealogical records of classics studies of the Han Dynasty. The need for restoring the lost texts of the Three Schools was apparent among contemporary scholars with the fact of great attention resulted from Feng Fang's pseudographs of the Three Schools. In addition, scholars in the Ming Dynasty collected and compiled numerous apocryphal texts of the Han Dynasty and regarded the result as a tool of textual criticism, which set up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Qing Dynasty. With the inheritance of efforts from scholars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stimulation of methods of distinguishing pseudographs as well as the influence of the trend in the collection and compilation of lost texts, scholars in the Qing Dynasty restored a quantity of the Three Schools with the Shicheng method and had a brilliant achievement. Furthermore, apart from *Gongyang*, *Shijing* also offered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factors related with the rise of the New Text in the Qing Dynasty.

Keywords: *Sanjiashi*, collection and compilation of lost texts(Jiyi), distinguishing pseudographs, Feng Fang, Fan Jiexiang